



罗福惠 著 武汉出版社

湖北近三百年 学术文化



罗福惠 著

武汉出版社

湖北近三百年 学术文化



鄂新登字(08)号

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

罗福惠 著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 19.375 印张 5 插页 字数 44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ISBN7—5430—1154—9/K·131

序 言

冯天瑜

置于读者案头的这部《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是罗福惠君的一部力作，它为我们从观念文化层面把握湖北近古以迄现代的文化流变提供了指南。

本世纪初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其主持的“湖北新政”取得耸动中外视听的实绩之际，于黄鹤楼欣然提写楹联云：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

张氏以“整顿乾坤”的“昔贤”继承者自命，高度评价湖北（联文称“江汉”）的关键地位，显示了一个近世战略家视野宏阔的“湖北观”。

湖北在春秋战国曾是孕育灿烂的楚文化的核心地段；秦汉以降，一统帝国的一统文化，重心在黄河中下游。晋唐之后，南方渐有崛起之势，而领先的是江浙一带，湖北只是偏师。诚如梁任公统计的，自两汉以迄宋明，见于史传的著名人物数量，湖北居全国中下游，远在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山西之下，也不及浙江、江苏、江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湖北当时的人文水平。清代中叶，湖北的人文状况在全国的地位更有所下降，然而，时至清末民初以降，湖北人文大有跃升之态，这实在是时势所赐予。1989年1月，我在为《湖北省志·人物志稿》作前言时，曾对此有所分析，现引述如次：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鸦片和商品，打破中华帝国紧闭的大门，中国逐渐由一个“大一统”的、沉睡的封建国家、演变为社会急剧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纳入世界统一市场，观念形态也随之出现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格局。然而，这种“千古之奇变”在疆域辽阔的中华大地展示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

中国接受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跨入近代社会门槛，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是广东，随后是福建和江浙。东南沿海诸省最先涌现一批“睁眼看世界”并进而“向西方求真理”的人物，如福建林则徐、严复，广东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江苏冯桂芬、王韬、马建忠、张謇等等。与这些先进人物的出现互为因果，近代工商业、近代新学和近代政治运动也由东南诸省和海外华侨社会中发轫。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开中国机器工业的先河，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成为维新派养成所，梁启超在上海主笔的《时务报》是变法喉舌。广东变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首先活跃的省份。而近代新学、近代政治运动连同近代工商业在东南诸省兴起后，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内地延伸、发展，形成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运动方向，这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迁徙方向恰好相反。

同东南沿海相比，近代中国的北方和西方较为落后、保守，在一个长时间，“北洋势力”是近现代中国反动阵营的代名词。而长江中游诸省，尤其是湖北、湖南，正处在较开化的东南与较封闭的西北的中间地带，借用气象学语言，长江中游处在湿而暖的东南风与干而冷的西北风相交汇的“锋面”，因而气象因素繁复多变，乍暖乍寒，忽晴忽雨。如果说，整个近现代中国都卷入了“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那么，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诚如晚清鄂籍留日学生所说，近代湖北是

“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湖北学生界》第一期）。这并非虚夸的惊世之论，而是有远见的预测。湖北在二十世纪初叶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继而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心脏地带、土地革命的主战场之一，便是有力的实证。

由于湖北位处冲要，尤其是它曾几度雄踞全国政治中心，这里演出过一幕又一幕悲壮激越的活剧，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英俊人物。就政治军事类而言，湖北涌现出为数众多的辛亥革命志士，据1956年的统计，当时仅居留武汉的辛亥武昌首义参加者便达600之众。湖北还产生过一系列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人中，便有五名湖北人，他们是黄安董必武、黄冈陈潭秋、包惠僧，潜江李汉俊，应城刘仁静，而且会议是在辛亥志士、湖北人李书城（李汉俊之兄）的上海公馆里举行的。就经济类而言，自汉口开埠和张之洞督鄂以来，湖北的近代工商业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官办实业的主持者、为外资奔走的买办、民族工商业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应运而生，如武汉刘歆生、周苍柏、武昌徐荣廷等。就科教——文化类而言，近现代湖北也是才俊林立，黄冈熊十力、李四光、王亚南，蕲春黄侃、胡风，浠水闻一多、徐复观，黄梅汤用彤，钟祥李济，黄陂谭鑫培、谭富英，罗田王葆心等，都是某文化门类领风骚的一代巨子。

福惠君是作，以翔实的材料，细致的分析，展开了自明清之际到解放初期的三百年间湖北人文状况的迁演，使我们得见桑梓起伏跌宕的时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福惠君的这部著作，除有体例周严，条贯清晰，评析公允等优长之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占有第一手文献方面用力真切。顾炎武在与人讨论自己的《日知录》编著情形时，十分强调直接

资料的运用，鄙视那种辗转抄袭的不良风习。顾氏说：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①

福惠君为搜求文献，遍查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颇有入山采铜的诚意与决心，终于直逼一手资料，诚然难能！这种努力使是著得以介绍出许多冷僻而又颇富典型性的湖北文化人，征引了大量不易得见，甚至濒临坏损的文集。仅从开掘和保存珍贵文献一点而论，是著便功不可没。

早在清末民初，一批鄂籍文人曾编辑《湖北先正遗书》、《湖北丛书》，并有编辑《湖北文征》、《湖北诗征》、《湖北献征》的倡议和实际行动，然限于主客观条件，可惜未能毕其功。八十年代初，我在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张之洞评传》二书时，在湖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的书柜得见《湖北文征》的若干册手抄本，深觉此类文献的弥足珍惜，曾多次呼吁继承前贤的工作，将这些大有利于了解湖北省情的丛书完成并加以出版，但迄今尚无结果。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福惠君的《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面世，可以部分地发挥上述未成之书造福桑梓的社会功能，这是作为鄂籍人的笔者要向福惠君深致感谢之忱的原因所在。

1993年6月30日于武昌寓所

①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目 录

序 言	冯天瑜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历史上湖北文化的三个高峰	1
第二节 近三百年的湖北文化值得研究	7
第二章 清代前期的湖北文化	16
第一节 湖北早期的理学诸家	19
(一) 胡承诺及其《绎志》	19
(二) 正统理学家熊赐履	34
(三) 曹本荣及其他诸人	52
第二节 经世实学的滥觞	56
(一) 清代开科状元刘子壮	56
(二) 吴正治、卢紘和鲁之裕	65
(三) 生物学者陈大章和数学家刘湘烽	72
第三节 熊伯龙及其无神论	78
(一) 熊伯龙的经历和经世思想	79
(二) 《无何集》的无神学说	85
第四节 人民诗人顾景星	96
(一) 顾景星的身世和性格	96
(二) 顾景星诗文的思想特征	105
第五节 杜浚和其他隐逸诗人	115
(一) 杜浚的生平与性格	116

(二)	杜浚的社会思想和文学主张·····	121
(三)	张仁熙和刘醇骥·····	128
第三章	清代中期的湖北文化·····	133
第一节	别具特色的经史汉宋之学·····	135
(一)	博览多述的程大中·····	136
(三)	“正学”之士李道平·····	145
(三)	批判理学的秦笃辉·····	155
第二节	经世实学的延续·····	170
(一)	数学家李潢和动物学家李元·····	170
(二)	陈运镇、袁铨和陈銓·····	175
(三)	彭崧毓·····	180
第三节	末世国士王柏心·····	189
(一)	王柏心的略历和著述·····	190
(二)	《枢言》的得失·····	193
(三)	《续枢言》的变化和进步·····	199
第四节	清代中期的湖北文学·····	203
(一)	大戟长枪喻文鏊·····	204
(二)	清苍幽峭的陈沆·····	212
(三)	奇才难用的刘淳·····	219
第四章	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湖北文化·····	232
第一节	渐趋不振的经世之学·····	234
(一)	勇于指陈时弊的诸人·····	234
(二)	维新的同路人屠仁守·····	237
第二节	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和曹廷杰·····	250
(一)	杨守敬的古地理学·····	250
(二)	曹廷杰的经历和重要地理著作·····	255
(三)	曹廷杰的思想变化·····	264
第三节	武昌先生张裕钊·····	274

(一)	低沉隐晦的社会思想	274
(二)	高穆的文论和诗作	281
第四节	亦谐亦庄的樊增祥	287
(一)	樊增祥的经历和诗作	287
(二)	樊增祥的“政书”和思想	303
第五节	传统文化的殿军甘鹏云	319
(一)	甘鹏云的经历及对家乡文化的整理归纳	319
(二)	甘鹏云论“治术”	324
(三)	甘鹏云论“学术”	338
第六节	湖北留学生与时代风云	344
(一)	国门外的寻求和呼号	344
(二)	留学生刊物的思想剖析	350
(三)	留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	358
第七节	辛亥精神与首义史学	362
(一)	秀才革命	362
(二)	当事人写史	373
第五章	“五四”以来的湖北文化	389
第一节	“五四”前后湖北思想文化动态	391
(一)	恽代英等新青年的成长	391
(二)	湖北的几种进步刊物	403
第二节	朴学大师黄侃	415
(一)	激进的革命青年	415
(二)	未曾宁静的学者	421
(三)	黄侃的学术成就	427
第三节	哲学家熊十力	440
(一)	熊十力的生平	440
(二)	熊十力的哲学思想	444
(三)	熊十力的文化观和政治思想	449

第四节	哲学史家汤用彤·····	461
(一)	早年的理学研究和文化观·····	462
(二)	对佛教史的系统研究·····	470
(三)	魏晋玄学的研究成就·····	478
第五节	考古学家李济·····	482
(一)	李济的经历和爱国精神·····	482
(二)	卓越的考古研究成就·····	492
(三)	李济的古史研究方法和文化观·····	501
第六节	卓越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	511
(一)	“科学救国”者的艰辛历程·····	512
(二)	杰出的科学成就和巨大贡献·····	520
第七节	经济学家王亚南·····	529
(一)	王亚南的生平经历·····	529
(二)	经济思想史研究和经济学思想·····	534
(三)	对旧中国经济的剖析·····	542
(四)	对官僚政治的考察批判·····	550
第八节	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	555
(一)	爱国、探索、斗争的经历·····	556
(二)	《真我集》、《红烛》和《死水》·····	570
(三)	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	577
第九节	戏剧大师曹禺·····	583
(一)	曹禺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	584
(二)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成就和 地位·····	594
后记	·····	608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历史上湖北文化的三个高峰

湖北是广袤富饶的神州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古时即称荆州，春秋战国时是楚国的中心；在统一的秦汉时代则主要属于南郡和江夏郡。汉末中土裂封，湖北于三国时一度分属于魏、蜀、吴，后归吴而入晋；南北朝时代，先属于南朝的宋、齐、梁、陈，后入北周版图而归于隋。隋置荆州大总管府，下辖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江夏等郡。

唐初，上述州郡分属于淮南、山南、江南三道；随后设山南东道，治襄州；荆南节度使，治荆州。北宋时，其地称荆湖北路，治江陵；还有部分属京西南路，治襄阳。元代，湖北湖南同属湖广行中书省。明代先承元制；稍后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两湖仍为一体，总督治武昌。至清康熙三年（1664）分为湖北湖南二省。

清代雍正、乾隆朝以后，湖北以武昌为省会，下辖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德安府、安陆府、襄阳府、郢阳府、荆门州、荆州府、宜昌府、施南府（今恩施）。入民国后，府县名称略有变动，特别是县所在的府或地区，范围变化较大，但整个湖北的行政格局大体相当固定。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之北，古来便是四战之地；武汉恰在长江、汉水的会合处，素有“九省通衢”之誉。省内西部和西北部

是巫山、大巴山山地；北部和东北部是桐柏山、大别山山地；东南部则是幕阜山山地，形成一个只有南面开口与湖南相连的盆地。盆地的中心是江汉平原，不仅长江、汉水贯通全境，更有数以千计的湖泊星罗棋布于其间，自古即有舟楫之利。气候四季分明，水量充足，物产丰饶，故迄今仍保持着鱼米之乡的美称。

湖北人恰当地评价自己的家乡，称“湖北非甚褊陋之邦。”^①这里开发甚早，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地理位置重要，内部可自成一局，而与国内各地的交通往来较为便利，有利于风气的开通和人才的流动；舟楫之便和鱼米之饶使其地的经济具有较好的基础，为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文化以历史积淀和经济发展为基础，其直接表现则是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民气的昂扬和普遍的创造精神，出为仕宦者的事功和文人学者的学术成就，则是较为具体可考的内容。

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重心及其移动情形就可知道，在华夏文明发展的早期，北方的殷周故地、齐、鲁、燕、晋与南方的巴、楚、吴、越，虽然犹如满天星斗，但显然疏密明晦有差。南方文化中奇葩楚文化，瑰丽新奇，丰富多采，尚天然而崇直觉；理性的深刻和事功的周密有效，则不及中原文化。到秦汉，统一的中国形成之后，政治、经济的重心在黄河流域，文化重心也在黄河流域。自那时直至唐代和北宋，重心均不出此范围，有移动也是沿渭水——黄河、呈东西方向的摆动。所以在这段时期内，文化巨人多数出自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只有在汉末以后的若干分裂割据时期，南方的吴、楚等地才有一度短暂的文化 and 人才兴盛。

从宋代开始，随着南方的开发和兴起，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东西摆动时，加上了沿着运河的、从北京——江浙的南北摆动；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南方渐渐后来居上。王夫之曾指出

① 《湖北通志》卷七十七，《艺文志序》，1921年刻本。

这一点,不过他有点错误地以“华夷”来区分“文野”;“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藪;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驻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①他还认为,到了明代,这一态势更加明显,“洪(武)永(乐)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②所说或许有些过分,所用标准也未必尽都恰当,但文化重心的南移,则是无可怀疑的。

有意思的是,考察湖北境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也有一个移动的过程。湖北的重心在荆州、襄阳、武汉三点,清人顾祖禹曾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他又说,“三郡之于楚,如鼎足然”。^③顾氏此论原为考察战争的形胜而言,但也无形中与湖北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契合相符。

“论湖北之人才,春秋楚为首,三国时次之,明又次之。”^④可以说,这是清代以前湖北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三个高峰。而这三个高峰恰恰依次出现在荆州、襄阳、武汉周围。

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颗璀灿的明珠。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是当时文学中的精美绝伦之作,并一直吸引着后人的崇敬、仿效和研究,是至今还在发挥着影响的文化遗产。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著名的政治家孙叔敖、军事家吴起,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人杰。楚都郢的城市建筑,远远超出当时诸国都城,“章台”的雄伟华丽,更是绝无仅有。此外,楚国的冶炼、纺织、歌舞、医药、髹漆,也相当发达,这些,从建国后所发掘出的楚墓出土文物

①② 王夫之:《思问录·外篇》。

③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论湖广》。

④ 《湖北通志》卷一百二十三,《人物志序》。

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楚地辽阔苍茫，地形多样，“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食物长足，故搢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①故人们不汲汲于衣食，亦罕积储逐利，而有兴致于崇尚自然、放任心灵、驰骋想象，又受南方“蛮夷”影响，崇拜多神。所以刘师培曾说，“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②屈原、宋玉的想象和抒情，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特色。

由于当时中国尚未统一，而楚国又是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自成中心，因而在文化上具有独特的性质，在中原影响较大的儒家、法家学说在这里影响较小。楚国地处南方之中，得以接触和吸收巴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及其他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从而使自己丰富多采。除了楚地中心的文化外，《老子》的清静自守，《庄子》的自由奔放，农家的“并耕”，《南公》、《鬼谷》、《鹖冠子》、《鬻子》的怪诞、庞杂，都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也可视为楚文化的支流。由于崇尚自然和张扬个性，所以这里又是盛产隐士的地方，不仅楚狂接舆、南公、鬼谷子是隐士，老子、庄子、许行也都具有明显的隐士性格。

正因为楚国的根本之地是湖广，故“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即春秋战国时代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荆州附近的郢。

秦朝统一中国以后，楚国的作为南方中心的地位丧失了，与中原文化的广泛交流和频繁接触，使楚文化深深地溶化于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中，它的特色逐渐淡化。由于此后统一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而襄阳正处在从湖广北上中原的咽喉和

① 《汉书·地理志》。

②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

门户之处，于是从汉代起，襄阳渐有取代荆州成为湖北重心之势。这就是所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东汉的刘秀集团就产生于襄阳附近，随后东汉的一些名臣和学者如王逸、黄香、周章、樊准、刘珍、黄琼、刘毅、刘驹、谢该，也多为襄阳附近人及安陆、云梦人。汉末天下大乱，刘表以宗室、州牧和学者的身份割据襄阳，与中原相比，前段较为安定，于是本地的黄承彦、庞统、马良、蒯越及外来的司马徽、诸葛亮，或仕或隐，均聚集在襄阳一带。后来曹军占据襄阳，刘备的主力入蜀，襄阳一带的士人各自东西，少数人入魏（如蒯越）、入吴（如诸葛瑾），多数人入蜀（如庞统、诸葛亮、马良、向朗、董允、费祎等）。楚才他用，湖北的文化和人才又成萧疏零落状态。

在自魏晋南北朝直到元代的漫长时间里，湖北本地产生的著名文化人物也不少，如东晋有史学家习凿齿。南朝有编《文选》的昭明太子萧统。唐代有学者李善、李邕，有诗人杜审言、孟浩然、皮日休、綦毋潜、张继，有作《茶经》的陆羽。北宋有学者崔遵度、宋庠宋祁兄弟、孙何、张景等人，有文学家令狐揆、文学家兼书画家黄休复、米芾、诗人魏泰等。南宋有理学家郭雍，元初有理学家赵复等。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无疑能进入全国第一流文化名人之列的人不多。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湖北已经失去南方中心的地位，在政治上不及黄河流域的重要，在经济上又不及江浙地区的快速兴起。虽然到了宋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和文化已有蒸蒸日上之势，江西也进入了人文鼎盛的时期，邻近江西的湖南湖北也渐渐走出文化低谷，开始复兴，但南宋时期的战乱和元朝的建立，又暂时阻止了两湖文化的上扬。

从明代开始，东南部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了北方。鄂东南最便于与外地、尤其是与江浙和东南沿海的交流，于是湖北的经济和文化就进入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

汉周围的黄州府、武昌府、汉阳府，无论就学校数、科举考试中式人数，还是所出文化名人数，都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荆州府、襄阳府在省内仍属发达地区，但其领先和重心的地位已经丧失，退居到次要地位。

明代是历史上湖北人文鼎盛的第三个高峰，此期湖北文化在中国的地位虽不及春秋战国时的楚文化，却超过了东汉、三国时期湖北文化的影响。自元末起，湖北民气渐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就有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则有胡美、康茂才、黄彬等人。成化年间，商品经济在湖北出现较大发展，汉口跻身为全国四大镇之一，省内受教育者普遍增加。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文化和民气的基础上，有明一代，湖北人才辈出。名将有王聪、王弼、王通、熊廷弼；著名大臣有杨溥、张居正、杨涟；文学家有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在全国文坛一领风骚；官员兼学者则有曹璘、李承箕、李承芳、鲁铎、戴金、颜木、王廷陈、毛凤韶、童承叙、熊桴、高翀、朱廷立、何迁、陈士元、李先芳、吴国伦、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李维桢、翟九思、汪可受、郝敬等等，著《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更是举世闻名的“医圣”。

综观两汉至明代的情况，依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第72—73页的有关资料统计，可以整理出一份姑且名为“两汉至明代南方见于史传的著名人物数统计表”：^①

① 此表已载于作者与高钟合撰论文《近代广东社会文化的历史成因》，《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